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 主办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LIBRARY



# 经管学科参考

2022 年第 7 期 总第 55 期

# 经管学科参考

2022 年第 7 期 · 总第 55 期

---

---

## 热点观察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1
推动构建更加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系·····	3
在高水平开放中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5
德国总理携“商业天团”访华 大众宝马加码中国市场·····	7

## 学科前沿

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10
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	12
强化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力资本支撑·····	14
完善人工智能国家安全风险规制的法治化路径·····	16

## 经管资讯

财政收入延续增长态势 积极财政政策助力稳经济大盘·····	19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世界第二 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有待深度融合·····	20
高水平对外开放再发力 六部委发文支持外资在华升级·····	23
解码全球价值链 中国企业应该怎么做·····	26
保障数据安全有序跨境流动·····	28

#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应从哪些方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怎样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如何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本报编辑部邀请相关专家学者详细解读——

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赵福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倪月菊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杨长湧

## 1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主持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过去十年，我国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有关表述，对今后开展这方面工作具有怎样的意义？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要重点抓好哪几方面工作？

赵福军：有关表述指明了我国今后对外开放和外贸发展的方向和重点。一是做实贸易底盘。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不断夯实贸易发展底盘，为贸易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二是以国内大循环为支撑，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三是参与国际循环，不断提升国内产业、内贸发展水平。对标国际经贸规则，按照国际最高水平和标准，提升国内产业、内贸发展的标准、质量水平，加快实现内外贸同线同标同质，充分发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带动贸易竞争力提升的作用。四是加快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提升贸易竞争力。牢牢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加快发展数字贸易，推动传统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转型升级。

倪月菊：“制度型开放”是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的。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制度型开放的内涵，即不仅应包含与国际通行规则的对接，还应包括规制、管理、标准的开放。这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将进入更高阶段，意味着我国要在更主动对接国际通行规则的基础上，统筹优化“内外贸一体化”的制度和标准设计，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既要持续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推进传统优势产业改造升级，还要从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优势。

杨长湧：对今后开展这方面工作具有三方面主要意义。一是体现对过去十年我国推进高水平开放工作成就的充分肯定，也表明我国推进高水平开放的总体方向和决心一以贯之。二是体现我国正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的深刻思考和鲜明导向。三是为未来我国对外开放新征程指明了方向。下一步贸易强国建设，需要重点关注高质量的制造业基础、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基础、增强对全球贸易治理的参与和推动能力，以及大力发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相适应的新兴贸易领域。

## 2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主持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泛滥的当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和重点有哪些？

倪月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了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的愿望。同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也是我国全力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平台，有利于我国优先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规则、制度和标准上的对接与协调，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认可与参与。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共建应充分体现健康、绿色、数字和创新的观念，努力将“一带一路”打造成为“健康丝路”“绿色丝路”“数字丝路”“创新丝路”。

杨长湧：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是要在“五通”框架下夯实发展根基、挖掘新亮点；二是稳步拓展合作新领域，在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领域打造新增长点；三是要统筹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四是加强风险防控和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有利于保障我国境外人员、资金、项目安全的风险防控体系。

赵福军：一是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和新动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必将会进一步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贸易、产业等发展，辐射带动全球经济发展。二是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今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必将会推动沿线国家规则标准对接、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将会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

### 3 实现经济合作共赢

主持人：如何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倪月菊：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其关键词是多元和稳定。所谓“多元”主要针对的是近年来甚嚣尘上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用新冷战思维构建“小圈子”的逆全球化行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带头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说不，在维护多边体系、构建全球经贸规则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所谓“稳定”是指在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数字经济领域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只有构建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才能尽可能避免世界经济分化，防止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防止“数字鸿沟”扩大，实现世界各国经济的合作共赢。

赵福军：理解“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至少要从以下三个层次看：一是维护多元化的合作伙伴经贸关系稳定。我国积极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深化同世界开放合作。二是维护贸易、投资、产业等多领域经贸稳定持续合作。比如：货物进口、出口多元化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稳定且持续发展。三是我国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推进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我国坚定维护和发展多边主义，推进高水平开放，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确定性，对冲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抬头态势；我国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重要贡献，推动全球形成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作者：冯其子

来源：《经济日报》2022年10月22日第011版

# 推动构建更加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系

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中国关于深化亚太合作、促进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主张。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此次会议，充分体现了中方对亚太经济合作的高度重视，相信中国将为推动亚太区域一体化、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 1 提振亚太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信心

今年 APEC 会议主题是“开放、联通、平衡”，聚焦亚太地区以及全球经济复苏。国际人士期待中国与地区国家一道，为促进亚太经济合作贡献力量。

“在平等相待基础上开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化解分歧，有助于亚太经济的发展繁荣。”智利太平洋基金会执行主任洛雷托·莱顿表示，中国反对单边主义、反对恃强凌弱，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合作的行动有目共睹，各方期待更多深化区域合作的中国智慧和中方方案。

泰国前总理阿披实·维乍集瓦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中国的参与使 APEC 这一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更有活力，提振亚太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信心”。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李明江期待中国为亚太地区维护粮食安全、应对供应链脆弱等挑战提供新思路，“相信各经济体将团结一致，推动构建更加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系，引领全球新一轮发展繁荣。”

秘鲁国立圣马科斯大学亚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卡洛斯·阿基诺表示，作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受益者，亚太各经济体应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坚定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丽贝卡·玛利亚表示，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中国主张将为亚太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 2 普遍期待深化与中国的合作

中国加入 APEC 31 年来，始终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始终致力于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亚太各经济体期待与中国加强合作，共创亚太地区美好明天。

APEC 工商咨询委员会前执行董事、新西兰国际贸易论坛执行董事斯蒂芬·雅各比认为，即将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在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面对共同挑战、需要加强团结合作的时刻召开的一次会议，习近平主席出席会议举世关注。

“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随着中国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亚太地区带来新的合作机遇。”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阿利斯夏巴纳表示，中国积极促进亚太地区互联互通，为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顺畅作出了重要

贡献。

韩国东亚研究所所长禹守根表示，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世界亟须以合作引领发展。中国在全球投资和贸易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期待中国在 APEC 平台上进一步与其他经济体加强合作。

澳大利亚时政评论人士戴若·顾比表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在推动各方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完善全球治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亚太经济体普遍期待深化与中国的合作。”

泰国国会主席兼下议院议长川·立派认为，中国在 APEC 等多边合作机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亚太乃至世界各国而言，中国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菲律宾金砖国家政策研究会创始人赫尔曼·劳雷尔表示，中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体，也是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经贸往来密切，APEC 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支持。

### 3 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扎实行动

在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多次阐述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和重大意义，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墨西哥国际政治专家赫拉尔多·托雷斯·巴尔德斯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此次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体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扎实行动。期待中国智慧为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和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指引。”

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驻泰国记者邱慧莉表示，亚太是全球最具增长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中国积极推动亚太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内多边合作，为亚太经济体树立了榜样。马来西亚期待同中国进一步加强经贸往来，携手为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贡献。

“亚太经济体正处于经济复苏阶段，需要合作共赢，创造并分享机遇，有效协调共同应对挑战。”国际女工程师协会前主席莫·杰琳说，亚太经济体利益深度融合，期待中国方案在此次会议上为地区发展与合作注入新动能。

菲律宾通讯社编辑颀利·穆思科说，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我们期待中国推动各方朝着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目标迈进，携手开创亚太经济合作新篇章。”

《澳大利亚人报》驻印度尼西亚记者黛安表示，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重启线下会议，亚太地区乃至国际社会对此次会议寄予厚望，期待与会各方达成促进亚太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新方案。中国是团结 APEC 各经济体、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相信中国将继续展现大国担当，同其他成员寻求更大的互利合作，造福亚太人民。

**作者：**任彦 章念生 孙广勇 赵益普 张志文

刘歌 马菲 谢佳宁 陈一鸣 毕梦瀛 陈效卫

**来源：**《人民日报》2022 年 11 月 17 日第 003 版

# 在高水平开放中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在刚刚闭幕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服务贸易展区汇集了来自 5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55 家企业，涵盖咨询、金融、文化旅游、商贸物流等众多领域。根据商务部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4722.7 亿元，同比增长 18.2%；其中服务出口 21480.2 亿元，增长 20.5%；进口 23242.6 亿元，增长 16.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院长蓝庆新日前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服务贸易已经成为我国建设贸易强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角色。

## 1 服务业开放格局逐步扩大

蓝庆新表示，服务贸易是衡量贸易强国建设的核心指标。近年来，全球服务贸易平均增速持续高于货物贸易。多家市场机构预测，得益于数字经济带来的发展机遇，服务贸易将成为全球贸易新的增长极。与此同时，服务贸易也成为促进我国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在对接“中国制造”和“世界市场”两大优势、释放更多外贸潜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阶段，服务业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蓝庆新认为，我国服务贸易在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开放步伐、发展基础等方面表现突出。

2013 至 2021 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 6.4%，比货物贸易年均增速快 1 个百分点。其中，服务出口竞争力不断提升，年均增长率高于进口 3 个百分点，带动服务贸易逆差大幅下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2%，服务出口增幅大于进口 4.4 个百分点，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 19.6%至 1762.4 亿元。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逆差呈收缩态势。

2013 至 2021 年，我国累计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 2.1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 9.3%，占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33.6%提升至 2021 年的 43.9%。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年均增长分别达到 34.7%、31%、19.3%。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不断优化，知识密集型服务竞争力增强。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北京、天津、上海、海南、重庆“1+4”的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格局，设立 28 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增加到 37 个，特色服务出口基地总数达到 112 家，覆盖文化、中医药、数字服务、人力资源、地理信息、知识产权和语言服务等 7 个领域。服务业开放格局逐步扩大，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2%，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53.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4.9%。前沿技术与服务供给端的加速融合推动服务业新业态蓬勃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战略新兴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在催生服务新需求的同时提高了服务的可贸易性。服务业发展基础较好，已经成为我国服务贸易迅速发展

的重要着力点。

## 2 服务贸易发展的青岛样本

作为国家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青岛市近年来服务贸易发展成效显著。2021年青岛市服务贸易总额突破1100亿元，增长37.1%，高于全国平均增速约21个百分点，连续3年实现贸易顺差。今年上半年，青岛服务贸易逆势上扬，实现服务贸易总额758.4亿元、同比增长53.1%，占全省比重达到57%。

为了更深入了解服务贸易发展情况，记者联系到了青岛市服务贸易协会秘书长王登银。他向记者表示，青岛市服务贸易发展始终围绕“制造产业内循环驱动服务贸易外循环，数字贸易小循环驱动服务贸易大循环，日韩合作中循环驱动国际市场大循环”的发展主线。

制造业与服务贸易正融合发展。青岛市工业互联网与服务贸易双向赋能工程的实施，促进了制造业服务贸易创新业态发展。以连续4年问鼎全国工业互联网“双跨”平台首位的卡奥斯为例，该平台聚集了众多用户和生态资源，既有卡奥斯D3OS数字孪生解决方案，可描述、诊断、预测实体工厂运行状态，指导企业经营决策；又有海云智造数字化生产运营管控系统，可打通离散制造业生产运营全流程；还有卡奥斯天云设备宝，可实现设备从登记、维保、点检维修到报废的全周期管理；更有模具定制与服务平台、模具物联智能管理方案以及能实现工厂的智能化管理、可视化管理、便捷性管理的离散制造设备智慧物联方案等。为服务贸易要素加速互动耦合、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王登银说，数字贸易正转型升级。青岛市将“数字贸易”列入服务贸易发展规划，推进数字贸易对服务贸易的创新驱动。青岛市的日韩服务贸易合作发展高地也正在形成。受益于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青岛市与日韩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不断提升。

据王登银介绍，前三季度，青岛市服务贸易规模超过百亿美元。传统服务贸易虽然仍占青岛服务贸易的主体地位，但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稳定增长，在服务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目前，青岛市服务进出口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外，美国、日本、韩国等也是青岛市服务进出口的主要贸易伙伴。

“青岛市服务贸易发展前景可观。”王登银表示，青岛市服务贸易不仅规模稳步增长，还受到多个全国首创制度创新成果的保障。如青岛市在全国率先实行出口退税“核实可视+信用赋能”模式，首次退税时间由20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出口退税“白名单”企业全部实现8小时退税，以及在全国率先通过接口方式与税务局直联，推动境内运费外汇支付便利化，平均每笔业务办理时间从1小时缩短至10分钟，让青岛市服务贸易发展能级不断提升。

## 3 多措并举推动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国正在向制造强国迈进，围绕发展高端制造业的现实需求，将数字技术和服务业进行深度融合发展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关键。”蓝庆新表示，要在高水平开放中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就要以数字技术拓展服务贸易发展空间。数字服务贸易在未来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数字经济能够提升服务的可贸易程度，对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至关重要，我国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蓝庆新认为，我国应当积极参与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制定。把握 RCEP 生效实施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将服务贸易领域作为自贸区战略提质升级的谈判重点，借力“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建设亚太地区服务贸易合作新平台新机制。加快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强化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合作，提升我国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话语权。

同时，进一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完善监管体系，促进数据、人才各类服务要素流动的自由化、便利化。

“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通常建立在人力资本要素的基础上。”蓝庆新告诉记者，2021 年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 2010 年相比，16 至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2010 年的 9.67 年提高至 10.75 年，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在不断提升，服务业人力资本红利将逐步显现。

在蓝庆新看来，当前我国在服务贸易制度创新方面还存在一定空间。全球服务贸易正处在加速发展阶段，涌现众多新业态，我国服务业的扩大开放需要紧跟服务贸易发展的前沿领域，强调对接国际高标准、高规则，推动构建高标准的服务业开放制度体系。为此，我国需要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机制改革，进一步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

作者：刘禹松 张寒梅

来源：《中国贸易报》2022 年 11 月 17 日第 003 版

## 德国总理携“商业天团”访华 大众宝马加码中国市场

11 月 4 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开启其首次访华之旅，随行的德方经济代表团也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此次访华团中，来自汽车企业的两位商业领袖备受关注，分别是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鲁姆和宝马集团董事长奥利弗·齐普策。

《中国经营报》记者从宝马方面获悉，奥利弗·齐普策表示：“德中关系迈过 50 年，贸易和创新是重要纽带。我很荣幸能作为企业代表团成员随朔尔茨总理访问中国。此次访问释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德中两国将继续加强经贸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主任杨解朴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表示，朔尔茨此次率“商业天团”访华，是在释放加强中德经贸合作的积极信号。一方面，力求将双边关系推向以经贸为核心的务实合作轨道上来；另一方面，借此访加强中德企业间合作，给德国的对外投资带来提振空间，给陷入低迷的经济找到更多的增长点。50 年来，中德关系从深度、广度上走出了全方位、广覆盖的成果，朔尔茨有责任赓续中德关系的发展成果，将双边关系推向更加深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 1 十二家企业随行访华

随朔尔茨来访的 12 位商业代表，来自大众、宝马、阿迪达斯等世界一流企业。当天，朔尔茨在北京表示，中国是德国和欧洲的重要经贸伙伴，德方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支持经济全球化，反对“脱钩”，愿同中方继续深化经贸合作，支持两国企业相互赴对方开展投资合作。

据有关媒体报道，有约 100 家德国企业或个人申请随行，但最终仅有 12 位获准，此次随朔尔茨访华的商界领袖代表的企业每年在华营收高达数百亿欧元。外界形容朔尔茨“把德国最大的品牌带到中国”。据了解，随朔尔茨来访的 12 位商业领袖代表，包括大众汽车、宝马集团、阿迪达斯、德意志银行、西门子、拜恩泰科、巴斯夫集团、喜宝集团、Geo Clima Design、瓦克化学集团、默克集团、拜耳集团的高管。据悉，此次随行的 12 家德企分量十足，既包括来自汽车、化工、制造业等德国传统优势产业的代表，也包括德国拜恩泰科等新兴的生物科技公司，覆盖了中德经贸中的重点领域与潜力行业。

对于德中经贸关系，不少德企都表达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奥利弗·齐普策表示，“德中商贸关系将是未来两国双边关系发展的桥梁。近期中国政府有关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坚持创新等表态令人鼓舞。我们看好中国市场中长期的发展前景。宝马集团将继续加深与中国企业的合作、与中国同频共进、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共创共赢。”梅赛德斯-奔驰董事会主席康林松在柏林的欧洲管理技术学院参加一场活动时也进行了表态——反对疏远中国，并称那些“想放弃中国”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他还提到，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德国汽车行业对中国非常依赖。

杨解朴认为，这些企业都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并且在中国拥有较大市场规模和份额，切切实实地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良多。它们是中德关系深入发展的亲历者和受益者。这些企业的随行来访，能给其他德国企业以引领作用，为促进中德企业间的交流、对话与合作发挥示范效用。同时也向外界表明，德国希望促进经贸为核心的中德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

回顾 1972 年建交至今，两国经贸等务实合作硕果累累，中德双边贸易额从不到 3 亿美元增长至 2021 年的 2351 亿美元。目前，有超过 5000 家德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2000 多家中资企业在德生产经营。两国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对华出口为德国创造了近百万个就业岗位。

“德国总理来访，表明中欧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依然是相当牢固的。由于各自比较优势的差异，中欧与中德经济本来就存在较强的互补性，相互经贸合作的潜力巨大，这是令德国政商精英不能忽视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大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忻华教授表示，能源危机导致欧洲内部滞胀严重，制造业成本高企，处境艰难，不得不对外寻找可以转移制造业资本的场所，而中国恰好是能吸收德国这种资本转移较好的投资目的地。此次朔尔茨访华，必然能够推动中德经贸合作关系得到大幅度提升，双边贸易额和德国对华投资额都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 2 加大在华投资

中国市场在德国企业的战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完备的智能电动车产业生态、优质可靠的本土化供应商和长期稳定的产业政策已经让中国成为全球企业投资的热土。“对汽车厂家而言，中国早已不只是‘最大单一市场’，

而是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中国乘用车产业联盟秘书长张秀阳表示。

大众汽车是欧洲最大的汽车集团，也是在中国布局时间最长的德国企业。“过去近 40 年，大众汽车集团携手中国各界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未来，我们期待塑造智能、可持续的移动出行新时代，并持续推动中德两国在经济领域的紧密交流。”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执行副总裁、公共事务与合资企业事务部负责人刘云峰在进博会上表示。

事实上，中国在大众汽车集团 NEWAUTO 战略落实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至 2024 年，大众集团将携手在华合资伙伴，在电动出行领域共同投资约 150 亿欧元，全速推进电动化转型进程。至 2030 年，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旗下各品牌车型中新能源汽车占比有望超过 40%。”大众汽车方面对记者表示。值得关注的是，10 月 13 日，大众汽车还迎来了 40 年来在华的最大一笔单项投资，大众汽车旗下 CARIAD 与地平线成立合资企业。其中，合资公司将由 CARI-AD 持股 60%，注资约 24 亿欧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167.85 亿元），交易预计将在 2023 年上半年完成。

而宝马集团也早在 1994 年正式进入中国，其在中国的合资公司华晨宝马明年即将迎来 20 周年的日子。今年以来，宝马沈阳生产基地迎来两个重大扩建项目的竣工——大东工厂产品升级项目和华晨宝马生产基地大规模升级项目。全新 BMWi3 已在这里下线。目前，宝马集团在中国有超过 460 家供应商，仅华晨宝马的本土采购额在 2021 年就达到 714 亿元人民币。数字化方面，宝马集团已经在中国建立了德国之外最大的研发和数字创新体系，并与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在内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合作，积极加入中国生态圈。

事实上，近年来，不少德企在增加对中国的投资。根据总部位于纽约的研究公司荣鼎集团的一项研究，梅赛德斯-奔驰、大众汽车、宝马集团和巴斯夫在 2018 年至 2021 年期间共占欧洲对华投资总额的 1/3。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今年 8 月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德国在华投资约为 100 亿欧元，创历史新高。

“中国一直也是梅赛德斯-奔驰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中国不仅已成为梅赛德斯-奔驰非常重要的创新中心，更是全球汽车行业转型的先锋。”梅赛德斯-奔驰方面对记者表示。随着中德两国在汽车工业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加速，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股份公司旗下公司——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宣布与清华大学签署为期 5 年的全面合作协议，将 2012 年成立的“可持续交通联合研究中心”升级为“可持续交通联合研究院”，携手扩展双方在智慧交通、智能汽车、交通新能源、本土化等领域的研究。此次深化合作是梅赛德斯-奔驰在华本土研发的又一里程碑。据了解，中国在梅赛德斯-奔驰全球研发网络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从 2005 年梅赛德斯-奔驰 E 级车作为首款国产车型投产以来，梅赛德斯-奔驰在过去 17 年间不断加强本土研发能力。2021 年，总投资超过 11 亿元人民币的中国研发技术中心在京正式投入运营，进一步加速新车型的本土化。2022 年 3 月，梅赛德斯-奔驰宣布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专注于自动驾驶与智能互联技术，不断强化其本土创新实力。

“2022 年恰逢中德建交 50 周年，我们有幸见证并参与了两国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未来，梅赛德斯-奔驰将加速在电动化和数字化领域的创新转型，携手本土伙伴推动汽车产业升级，为深化中德合作作出贡献。”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负责大中华区业务的唐仕凯表示。

**作者：**陈燕南

**来源：**《中国经营报》2022 年 11 月 14 日第 C05 版

# 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社会生产力的直接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体现了我们党保持经济稳中求进的坚定信心和应对当前复杂形势的战略定力。

## 1 保持经济稳中求进必须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根基

实体经济是我国人民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实体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是人类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过去，人类解决温饱和短缺问题，依靠的是实体经济的发展；未来，人类要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和水平，仍需要依靠实体经济的发展。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动经济建设，从根本上讲，还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这必然依赖于实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发展实体经济是由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决定的，是我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

实体经济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新的伟大成就，2021年我国GDP总量达到了114.4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为2012年的1.8倍，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8.5%；人均GDP达到80976元，比2012年增长69.7%，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2551美元，超过世界人均水平。这些成就的取得，关键在于我国一直致力于发展实体经济，经济基础和发展战略自始至终没有脱离以工业制造为核心的实体经济。面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我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一根基，按照新发展理念要求，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显著进展。目前，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稳步提升、经济结构在调整中改善、企业效益趋向好转、新的增长动力机制逐步形成，我国正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

实体经济作为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经济活动，是现代产业体系的基础部分。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部门，也是核心部分，发挥着基础性、主导性和引领性作用。发展实体经济必须要抓住制造业这个“牛鼻子”，筑牢实体经济的根基，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虚拟经济应当产生并服务于实体经济，有效发挥其媒介资源配置的功能，以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反，如果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则会产生经济泡沫，带来经济社会风险，甚至削弱整个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和增长基础。我国在建设现代经济体系时，必须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一核心，而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要回归于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否则整个经济体系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 2 应对当前复杂形势必须做强做优实体经济

当前，我国正面临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交织影响，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战略定力，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是应对当前复杂形势的根本。

首先，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是提高我国综合实力，应对国际竞争的根本选择。纵观历史，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大经济体，无一例外地都要依赖于一个庞大而高效的物质生产体系，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源于其组织大规模分工协作的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目前，全球价值链加快调整和重构，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日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哪个国家具备更强大的实体经济，尤其是更强大的制造业，那么就会在竞争中占据优势，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

其次，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是解决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根本途径。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样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矛盾，对未来发展造成了一定挑战。一是产业结构失衡。很多行业中产能过剩与产能不足并存，社会资本大量向一些领域集中，造成了严重产能过剩问题，同时很多领域存在严重产能不足，甚至很多产能过剩产业的高端环节，也依赖于大量进口。二是区域结构失衡。部分东部沿海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而部分中西部地区还处在工业化前期。三是收入结构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 0.45 以上，近年来虽然出现明显下降，但仍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面对这些问题，必须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最后，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是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手段。金融风险是当前中国经济最突出的重大风险之一，而造成金融风险的根本原因，就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会形成巨大的虚拟经济“泡沫”，成为吸纳社会资源的引力“黑洞”，导致金融风险。化解金融风险的最好方法就是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吸引虚拟经济重新回归实体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渐消除资产泡沫，降低杠杆率。

### 3 以创新驱动战略提高实体经济发展质量

目前，中国已建立起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并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然而经济“大而不强”的问题仍十分突出，很多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在关键环节受制于人，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为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着力提振实体经济，就必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第一，加强基础研究，激励自主创新。要加大对世界科技前沿、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强新技术产品的品牌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公平开放透明的竞争环境，建立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

第二，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加快发展智能制造，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为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第三，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组织各层面优势创新资源，推动产学研一

体化，针对一些共性技术、关键技术、核心技术进行集中突破，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

第四，优化竞争环境，释放企业创新活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提高侵权行为成本，确保市场机制的公平高效，为企业家捕捉盈利机会、创新商业模式、从事经济活动提供支持。

作者：原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0月25日第001版

# 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吹响了新时代新征程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前进号角。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持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 1 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

与高速增长相比，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机制、发展模式等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就要求我们大力推动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强调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创新驱动发展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党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创新处于首要地位，发挥先导作用。只有以创新为核心、为动力、为先导，才能真正实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其次，创新驱动发展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因素。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进一步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创新驱动，从根本上改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进一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创造新产业、培育新动能、形成新优势，引领和驱动高质量发展。再次，创新驱动发展是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制高点的重要基石。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深入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各国之间围绕产业、技术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的竞争日趋激烈。只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打造发展新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引领中国经济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成就的取得更加彰显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意义。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再到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表明我们党对创新驱动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新时代十年，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从1万亿元增

加到 2.8 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60%，基础研究经费是十年前的 3.4 倍。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 2012 年的第 34 位上升到 2022 年的第 11 位，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十年来的实践雄辩地说明，只有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才能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完成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任务。

## 2 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

第一，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精准定位和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布局，加快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逐步改革和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科技投入体系和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着力培育创新文化。

第二，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通过期权、技术入股、股权奖励、分红等激励形式，激发企业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注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的引领支撑作用，促进行业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融通创新，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深化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围绕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进行科技创新，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第三，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体制机制。一是支持企业联合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共建需求对接、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开展技术定制、测试检验、中试熟化、产业化开发等，助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二是建立信息渠道畅通、服务功能齐全、交易活动有序的技术交易市场，健全技术交易市场运行机制，提高其运行效率。三是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引导技术转移转化机构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发展，提升科技成果产业化水平。

第四，加强自主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围绕基础前沿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科学问题进行持续性攻关，加快攻克一批原创性引领性技术，努力实现更多“从 0 到 1”的原创性技术创新突破。重点攻克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掌握更多“撒手锏”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力度，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第五，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进一步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对外国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和重点实验室的引进，与我国企业、高校及研发机构结成创新联合体，围绕国际产业链关键环节与重要节点的关键共性技术进行合作研发。积极融入国际产业链和全球创新网络，推动技术成果共享、知识溢出与创新能力提升，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制造业关键技术缺失、成因及创新突破路径研究”（19AZD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杜传忠（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 年 10 月 27 日第 001 版

# 强化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力资本支撑

依据党的二十大精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可以说，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环，对保持经济繁荣稳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必须完整、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始终坚定不移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不断强化完善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体系，夯实我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根基。

当前，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高质量发展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因此，这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意义上高投入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实体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已经势在必行。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实体经济的市场活力根本在于人才，因此强化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支撑尤其关键。

## 1 实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人力资本依附在劳动力身上，是经济学家对人的经济价值的量化，主要体现在劳动人口的知识技能、文化技术水平、健康等与劳动者不可分割的资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普及高等教育的方式为现代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的资本。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9.91 年。此外，2022 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已经突破 1000 万。实现高质量增长目标，归根结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依靠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人力资本主要体现在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人力资本的数量是指掌握一定技能的劳动力规模，人力资本的质量则是指劳动力所掌握技能的复杂程度，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都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就理论逻辑而言，人力资本影响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可归为如下两类：第一类认为人力资本存量影响经济增长，以 Romer、Grossman 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人力资本作为研发投入，通过研发活动带来产出的持续增长。第二类认为人力资本增量影响经济增长，以 Lucas、Uzawa 为代表的学者，强调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把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引入生产函数，通过引入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使人力资本增长突破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约束，从而带来长期增长。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取得显著成就，人力资本存量和增量都呈现明显扩张的趋势，每年新增高校毕业学生数百万人。人力资本结构显著变化，表现为低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比重不断下降，高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比重持续上升，高级人力资本逐步替换初级人力资本并占据主导地位。

由于人力资本具有向下兼容特征，高水平人力资本能够做低水平人力资本从事的工作，以初级人力资本向高级人力资本演进为特征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能够通过稀缺的生产配置能力、科技创新能力与吸收能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 2 优化人力资本行业配置结构

理论上，劳动人口受教育年限提高可以显著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但是这一结论在宏观现



实层面并不一定成立。许多关于我国教育和创新的经验研究发现，1999 年以来我国通过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方式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但是如果将人力资本用于增长核算中，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相对有限，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升对国家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绩效的促进作用有待提升。更好实现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创新这样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需要更好契合我国现实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

笔者认为，这与我国人力资本在行业间的配置有关。基于人口普查大样本数据的统计表明，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长期比较低，初中学历的就业人口占比超过 50%，受过高等教育就业人口占比 10%左右，高水平高层次人才短缺的问题特别显著。笔者使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详细的个体职业和受教育程度信息构造城市一行业层面人才配置指标，发现我国人才配置存在“离实体经济”的倾向，提高了实体经济生产成本并挤压其发展空间，实体行业人力资本配置没有达到最优，导致平均受教育水平对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不够显著，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创新驱动转型。

另有文献提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现代金融的快速发展使得人力资本配置更多偏向于金融行业，一定程度限制了实体行业人才配置。比如，人力资本过度配置到金融部门可能会挤出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在生产部门的分配；金融部门会将财富从生产部门转移走，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内在激励变弱。然而，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实体部门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将是逐步上升的。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人才需求缺口、让人力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促使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本沉淀到实体经济，为实体创新部门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本，从而发挥人力资本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

### 3 有序引导人才流向实体经济

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原创式创新引领道路，就必须依靠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作为基础。有序引导聪明大脑进入实体行业，让实体经济成为科技创新最活跃的领域，从而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创新体系。为此，中国目前应当注重提高实体创新部门的吸引力，把实体经济打造成人才汇集高地。具体思路并不复杂，需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构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期优势；二是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拓展实体经济就业人口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渠道；三是改善市场预期，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培育一批高质量的实体企业。

第一，构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期优势。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注重“量”的稳定，更要着眼长远致力“质”的提升。我国在高铁、航天、5G 等高技术制造业领域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领域发展也非常迅速，下一步要促进产业链向高端环节延伸，形成高精尖产业发展新动能，塑造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期优势。同时，以加快布局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为牵引，通过强化产业基础能力建设，推动实现实体经济整体技术创新。在重大科研攻关问题和“卡脖子”关键技术领域，充分发挥国家重大创新平台的体制优势。

第二，完善收入分配体系，拓展实体部门从业人员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渠道。当前，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关键一环就是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与比重，实体部门就业人口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制造业就业人口收入水平大约是城镇平均收入水平的 80%—90%之间，距离中等收入群体仍有一定距离。更重要的是，货币收入差距会影响人力资本行业配置结构。笔者通过理论模型发现，在一定条件下，货币报酬对能力具有报酬递增性，即能力相差  $N$  倍的两单位劳动力，其收入分配的差距将大于  $N$  倍。人力资本

在实体经济部门的配置需要有足够的货币激励为基础，因此，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关键着力点在于，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让实体经济就业人口至少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第三，改善市场预期，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培育一批高质量的实体企业。经济学著名的“卢卡斯批判”告诉我们，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政策变动对人们预期影响，因此传统政策分析很难评价经济政策的效果。同样，市场预期也是影响人力资本行业选择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就宏观增长环境来看，制造业产出份额经历了一定程度下降的过程，进入新时代，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在合理区间、推动实体行业结构优化升级才能够实现稳定市场预期的目标。对进入企业的劳动力来说，稳定的实体企业可以带来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对实现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因此，要从根本上赋能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培育一批高质量的头部企业，积极营造有利于实体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为优秀人力资本选择实体经济就业提供稳定的发展预期。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产业动力机制研究：基于生产网络的视角”（72073056）、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十四五’时期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路径研究”（20JJA036）阶段性成果）

作者：王启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孙广生（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0月26日第005版

# 完善人工智能国家安全风险规制的法治化路径

人工智能国家安全是当代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无论是制度上还是学理上都亟须对人工智能国家安全风险法治体系进行整体规划。为此，需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安全风险规制的人类共同价值目标基础上，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国家安全法治体系。

## 1 “人工智能国家安全”的法学界定

“国家安全”的现代用法最早出现在美国作家李普曼 1943 年出版的著作《美国外交政策》中。1947 年，美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安全法》，并组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我国也于 2015 年通过了新的《国家安全法》。总的来说，传统法学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是指一国法律确认和保护的国家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威胁和危险的客观状态。内部威胁来自于威胁国家安全的本国公民和组织，外部威胁来自于威胁国家安全的其他国家或组织。传统国家安全是一种物理安全意义上的客观安全，主要包括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

与传统法学语境相比，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安全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安全是一种 security，而不仅仅是 safety。“safety”重在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如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原则，旨在确保机器人不会伤害人类；而“security”则意指政治、经济、

文化、生态等方面的总体安全，而非对国家的财产和国土这类物理客体的威胁，如数据跨境流动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二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安全风险处于三方结构而非两方结构之中。传统国家安全处于“国家一个人”或“国家—国家”的两方结构之中，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来自个人或其他国家。但在人工智能时代，在这两方结构中又加入了“人工智能”这一方。人工智能既可能被个人或其他国家有意用来威胁国家安全，也可以由于技术失控或误用、滥用而产生溢出风险，额外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

总的来说，在法学上，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安全指的是国家利益免遭因人工智能的误用、滥用以及失控所造成之风险的总体安全。这种安全从外延上看遍及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各方面，从类别上看统摄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其要求有三：一是通过法律降低人工智能不成熟性以及恶意应用给国家社会带来的安全风险；二是通过法律推动人工智能在网络安全和公共安全领域深度应用；三是构建人工智能安全的法治体系，保障人工智能国家安全稳步发展。

## 2 人工智能国家安全风险规制法治化的理论基础

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基于进化赋能的实践应用，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两者间的重叠领域，为国家安全提供更为有效的维护和保障机制。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存在着超出预期设想的可能性，存在因技术滥用而导致的外溢风险与因技术自身缺陷而产生的内生风险。为应对这两类风险，需要首先夯实人工智能国家安全风险规制法治化的理论基础：一是风险社会的法治原理，二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模式的变迁原理。

人工智能安全风险规制是风险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与传统社会模式不同，风险社会中最为稀缺的价值需求就是对于确定性的追求，法律作为一种确定性的价值在风险社会的运作中充当着最佳的调控模式。同时，风险社会的治理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法治的新要求：一是法律要在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保持平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了“软法革命”，制定具有灵活性和弹性化的法律规范可能给重大风险的应急和处理带来更为可期的良好效果。二是需要法律将规则确定性与原则指引性相结合。在风险社会，新技术的发展前景尚不完全确定，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关系变化的结果尚未完全固定，应增强法律的原则指引性。相反，一旦当相关领域的社会关系固化下来，或某些做法被证明行之有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以稳定不变，就可以上升为具体明确的规则。三是要求倚重事先预防的方式来应对风险。科技风险会引发大规模的、人为的灾难性后果，预防原则应当成为政府以法律的手段因应科技风险的主要原则。

人工智能安全风险规制法治化的思路也与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模式的变迁休戚相关。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主要反映的是熊彼特技术创新模式。熊彼特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效益创新模式，其核心内涵是市场要素的商业化组合。它有四个主要特性：有足够的商业利益、满足用户需求、有税收、高效率。效益创新模式不要求产品满足功能性因素之外的伦理要求，因此出现伦理风险不可避免。显而易见，这种创新模式已不再适合于风险社会中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尤其不适合于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人工智能时代法律所保护的创新模式应当从效益创新模式升级为公义创新模式。后一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与效益创新主要追求经济效益的显著增长不同，公义创新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同提升。第二，与效益创新将目标对置于满足用户需求的具体产品/服务不同，公义创新的目标对象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工/人造系统。第三，与效益创新延续、强化工业文明传统不同，公义创新探索更具包容性的文明路径。在这种新模式下，法律对人的关

注将得到根本性加强，对人和机器的认识将大幅度更新，人与机器的关系在法律上将得到重新定义。法律将在福祉原则的指导下，推动人、机器和环境的更具包容性的一体化发展。

### 3 人工智能国家安全风险规制的法治框架

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运作理念将由“如何修复和恢复社会”转向“如何规训和塑造社会”。人工智能国家安全风险规制应采取一种重在预防、重在塑造相关主体行为逻辑、重在风险规制的模式。基于这一模式，应当构建以法律规制为核心、多种规范体系和治理机制协力的人工智能国家安全风险规制法治体系。具体而言，这一体系应由三重框架组成。

一是价值—规范框架，它从高到低由三个层次构成：顶层是“基本原则”，以“国民福祉原则”为核心，以“可信可控原则”和“人类监管原则”为支撑；中层是“一般伦理准则”，包括合法合规、风险防范、安全透明、敏捷治理、稳健性（鲁棒性）、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公平性和问责性等；底层是“具体实施细则”，包括产品标准（企业标准）、技术标准（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规范、产业政策、法律法规和伦理守则等多方面的具体要求和规范。

二是区分和评估框架，包括人工智能国家安全风险的区分监管框架与人工智能国家安全风险的评估框架标准。前者又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人工智能国家安全风险的分类，包括网络国家安全风险、数据国家安全风险和算法国家安全风险；其次是人工智能国家安全风险的分级，包括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场景的国家安全风险分级，以及网络国家安全风险分级和数据国家安全风险分级；最后是人工智能国家安全风险的分阶段监管，包括人工智能系统开发过程中、投入使用前、使用过程中的风险监管以及系统漏洞的应对与事故处置。后者则包含人工智能国家安全风险评估的总体要求和可行的评估基本清单。

三是治理体系框架，包括人工智能国家安全风险的治理体制、治理措施和治理机制。人工智能国家安全风险的治理体制包括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中央和省级地方两级的审查和监管机构（包括规范化和标准化机构），以及负有安全风险审查和报告义务的创新主体（企业、科研机构）。治理措施包括技术方法与非技术方法两类，治理机制则包含被动防御机制、主动防御机制、情报信息机制、反制进攻机制等层级。

（本文系 2022 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人工智能国家安全风险及其治理体系研究”（CLS（2022）C15）阶段性成果）

**作者：**冯洁（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 年 10 月 26 日第 006 版

# 财政收入延续增长态势 积极财政政策 助力稳经济大盘

日前，财政部发布了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支情况。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3151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4.1%。

总体来看，前三季度财政收入继续恢复性增长，大规模留抵退税结束后，财政收入已连续两月保持正增长态势，为四季度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发力加码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财政支出力度不减，助力三季度经济实现企稳回升。

从主体税种来看，国内增值税(33347 亿元)在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2%，国内消费税(7.3%)、企业所得税(2.1%)、个人所得税(9.1%)、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1.3%)等均有不同程度增长。出口退税同比增长 16%，有力促进了外贸出口平稳发展。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前三季度企业所得税实现正增长，成绩来之不易，表明前期一系列助企纾困的政策为修复企业资产负债表与现金流量表，保证企业主营业务正常开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放水养鱼”的政策意图得到了良好贯彻，为企业带来了实打实“真金白银”，而企业抵御风险能力的提高与经营状况的改善，又成为保证税收收入稳定增长的“压舱石”。

从财政支出的视角来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2.50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6.5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1%。中央支出的增速高于地方，并借助转移支付以及财政直达机制稳固地方财政，体现出逆周期、跨周期的政策力度与全国财政的“一盘棋”思维。

从主要支出科目来看，前三季度，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科学技术支出、交通运输支出为主要支出项。积极财政政策支出刚性不减，特别是加大了对普惠性、兜底性民生支出的保障力度。在财力保持紧平衡的情况下，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依靠举国体制助力创新水平实现跨越式进步，财政对科学技术的支出仍保持高水平，体现出财政政策延续贯彻“有保有压”的意图。从支出进度来看，前三季度，财政支出进度已达到 71.3%，四季度为继续保证经济延续回稳态势，支出进度有必要进一步加快。

展望四季度，积极财政政策仍可在优化结构、促进消费、支持投资以及提升效率四方面做文章。首先，相对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天然的结构政策，应立足高质量发展要求，发挥其优化结构与“精准滴灌”的政策效应，对国民经济的重点及薄弱环节，涉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及部分“专精特新”重点企业继续给予支持，特别是要继续用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一优惠政策，使企业放开手脚，减少束缚，敢于扩张，勇于研发。其次，积极财政政策在四季度应当着力促进居民消费回稳。今年以来，经济受到“三重压力”的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不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慢于整体经济增速，同时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快速提升。因此，积极财政政策需要着重聚焦于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增加居民收入。第三，随

着前期地方债加速发行以及各类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积极财政政策通过支撑投资，有效实现了逆周期、跨周期对冲，保证了三季度经济企稳回升。四季度，财政政策除继续关注基建项目外，也应适当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的支持力度，提高经济体系中的有效投资占比。最后，积极财政政策要延续“花钱必有效，无效必问责”的导向。在财政收支多年保持紧平衡的情况下，财政资金的支出管理显得尤为关键。提升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率，一是可以杜绝无效浪费，二是可以督促资金使用单位更快形成实物工作量。此外，还要继续发挥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的“强基层、惠民生、促发展”效果，发挥好其“快、准、严”的特征。

作者：胡光旗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22年10月27日第004版

##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世界第二 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有待深度融合

我国数字经济总体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日益凸显。

在近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国务院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提请审议。

《报告》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加快增长，截至2021年，全国软件业务年收入达9.6万亿元，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大数据产业规模达1.3万亿元，并成为全球增速最快的云计算市场之一。

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的数字化水平加快。电子商务、移动支付规模全球领先，网约车、网上外卖、数字文化、智慧旅游等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必须依靠创新发展驱动的模式，来推动质量效益的提升。以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引领和促进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孙其信在分组审议时说。

同时，《报告》也指出，我国数字经济还存在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等问题。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还需完善。

《报告》建议，不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数字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包括集中推出一批平台经济“绿灯”投资案例。

“在强化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监管执法方面，要根据党中央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的要求，推动监管由事后向事前、事中延伸，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研究员刘金瑞说。

## 1 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

“双 11”将在 10 月 31 日晚上正式开启。“双 11”狂欢的背后，是我国电子商务等数字经济的发达。

《报告》指出，全国网络零售市场规模连续 9 年居于世界首位，从 2012 年的 1.31 万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13.1 万亿元，年均增速达 29.15%。

据中国信通院测算，2021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 45.5 万亿元，占 GDP 比重 39.8%，规模居世界第二。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也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下称《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指出，截至今年 6 月，全国登记在册数字核心产业企业达 509.5 万户，占全部企业的比重突破 10%。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转型升级。《报告》指出，全国具备行业、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 150 个，重点平台工业设备连接数超过 7900 万台套，服务工业企业超过 160 万家，助力制造业降本增效。

2021 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72%，农机应用北斗终端超过 60 万台套。

在服务业数字化方面，电商、网约车、网上外卖、数字文化、智慧旅游等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一些新的业态还在不断孕育。

“以元宇宙理念为引领的场景融合创新时代来临，为数字文化产品的产品创新、业态创新带来新的想象空间，Web3.0 为内容众创、共享和分配提供了新的机制。”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融合创新发展中心主任陈端说。

数字经济还有力推动了就业和社会发展。《调研报告》指出，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创造吸纳大量就业，2021 年电子商务从业人员超 6700 万。

麦可思研究院数据显示，通过连续 10 年对应届本科生就业进行调研发现，互联网开发人员、计算机软件应用工程技术人员和计算机系统软件工程技术人员连续 10 年位居高薪职业前十。并且 10 年间，它们的薪资涨幅均超过 50%。

## 2 加强关键领域创新能力

不过，我国数字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娱乐和消费领域领先、产业互联网发展不足，数字鸿沟有待弥合。

作为传统产业，农业、工业的数字化率较低。《调研报告》指出，2020 年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渗透率仅为 19.5%，低于发达国家 33% 的平均水平，特别是纺织、化纤、金属冶炼等传统行业数字化水平偏低。智慧农业处于起步阶段，农业生产、流通、销售端的数字化率较低。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也较慢，部分企业对数字化转型“不愿”“不敢”“不会”。《调研报告》指出，有关机构测算，现阶段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约为 25%，低于欧洲的 46% 和美国的 54%。

尤其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滞后。《调研报告》指出，有数据显示，2021年79%的中小企业仍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初级阶段。

“我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首先是技术驱动型，技术创新打破了原有的产业边界和价值创造模式，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陈端说。

但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足恰恰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短板。

对此，《报告》提出，加大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关键软件、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重点领域核心技术创新力度。着力提升基础软硬件、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智能制造装备的供给水平，加快锻造长板、补齐短板。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如何更好融合，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平台经济的负外部性？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在审议时指出，“在充分肯定电商也就是网络经济有正面影响的同时，是否也要充分认识数字经济可能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如电商过度发达，实体店就必然相应减少，大家少了逛实体店的体验，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也有些不利。”

数字鸿沟是一个亟待弥合的问题。《报告》指出，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数字化基础不同，发展差异明显，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魏后凯在审议时建议，进一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投入的力度，加大对低收入人群、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数字知识、数字技能、数字素养的培养。

### 3 加快明晰资本“红绿灯”制度

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数字经济治理提出了要求。

《报告》指出，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还需完善。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则制度体系有待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尚在建设，既能激发活力又能保障安全的平台经济治理体系需要完善，与相关法律法规配套的各类实施细则亟待出台。

尚不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体现在，在数据确权、交易、算法规制等普遍性基础性问题上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对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科技伦理等重点领域的调整和规范落后于产业革新升级，不同立法、政策、规定在规则设定上协调性不够。

此外，数字经济治理需要跨部门协同、多方参与，但相关治理机制还需完善。

《调研报告》指出，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行业和属地监管模式难以适应数字经济跨地区、跨行业、跨层级的特点，容易造成“系统性战略碎片化”。

《报告》指出，要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创新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支持互联网企业不断加强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鼓励平台企业依托市场、技术、数据等优势，赋能实体经济，支持平台企业不断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

政策鼓励数字经济发展，需要与数字经济治理相协同。

刘金瑞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以公平竞争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深入贯彻新反垄断法的有关规定，需要处理好反垄断与促进创新的关系，需要从国际竞争力视角看待规范与发展关系，需要通过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来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有序发展。



《报告》提出，支持和引导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

《调研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明晰资本“红绿灯”制度，支持平台企业依法依规在境内外上市融资。明确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和义务，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实施常态化监管，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

陈端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去年以来，国家层面加大了流量经济整肃和互联网反垄断力度，文化创新首先要把握好各项政策背后的底层逻辑。我国数字文化产业下一阶段发展的真正动能，蕴藏在服务实体经济和乡村振兴这样的国家战略大局之中。

《调研报告》还提出，支持平台企业扩展国际市场。继续加强与外方监管机构的沟通，维护我海外上市平台企业合法权益。建立健全司法协调、争端解决等机制，为平台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我国在完善和落实公平竞争法律制度时，应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尤其是关注国内立法执法会引发跨国影响的‘溢出效应’。”刘金瑞说。

作者：王峰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2022 年 11 月 11 日第 006 版

## 高水平对外开放再发力 六部委发文支持 持外资在华升级

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国再出重磅政策措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以制造业为重点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若干政策措施》（下称《若干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大制造业引资力度，着力解决外商投资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全面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服务，推动利用外资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在优化投资环境，扩大外商投资流入；加强投资服务，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引导投资方向，提升外商投资质量三个方面推出了 15 条举措，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利用外资工作的方向和重点任务。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王军告诉第一财经，《若干政策措施》是二十大后第一个展示我国开放的重磅举措，不仅向外界传递了中国持续开放的积极信号，直接向外资尤其是制造业外资喊话，而且也是间接对金融市场的一种回应。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庞溥对第一财经表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对进一步吸引外资是正面的、积极的、重大的利好。外资和外企在相关支持政策和改革措施的助力下，积极投资、加快布局、稳妥经营，就能更好地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坚持合作互利共赢、坚持市场化导向，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便捷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

更好地推动全球和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经济一体化进程,有利于稳外贸、稳外资、稳增长、稳经济。

## 1 十五条支持举措

在优化投资,扩大外商投资流入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将做好2021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工作,确保新开放措施及时落地,尽快将开放政策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外资项目。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要求,对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管理。继续清理负面清单之外的限制性措施。

同时,高标准落实外资准入后国民待遇。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依规平等享受国家产业发展和区域发展等支持政策,确保外商投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经营运行、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制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等。

“中国投资环境近年来是在不断改善的,每年都更新的负面清单,正在变得越来越简化和清晰,这对于外资准入具有极大的帮助。”王军认为,准入后的国民待遇以及在推动外资项目落地过程中具体的政策支持,也都越来越清晰和实在。

在推进推动外资项目签约落地上,《若干政策措施》明确,发挥重大外资项目牵引带动作用,给予项目用地、环评、规划、能耗等政策支持。加大重点外资项目支持力度,加强用地、环保、物流、人员出入境等方面的服务保障。健全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机制,推动一批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尽快落地。

庞溟认为,推动重大外资项目落地实施,鼓励外商积极投资中高端制造、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产业等领域,尤其是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和中西部地区,可以促进优质外企的核心业务契合中国的市场需求、变革趋势和可持续发展机遇,同时优化我国引资结构、稳定外商投资规模、吸引外资量质齐升,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带动人才、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加速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实现科技、资本与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

在加强投资服务,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方面,《若干政策措施》第七条关于“便利国际商务人员往来”的举措引人关注。根据《若干政策措施》,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前提下,便利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高管、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出入境。各地方要用好用足中外人员往来“快捷通道”,结合当地实际,进一步明确标准和流程,为外籍人员来华提供便利。

德国科技集团贺利氏电子全球业务单元总裁布鲁纳(Klemens Brunner)告诉第一财经,他在疫情后第一次飞来了中国,在经过了“7+3”的隔离管控后,见到了当地的客户。

这一举措无疑将为像他这样的跨国企业高管提供往返中国的更大便利。王军认为,人员便利往来方面受疫情影响较大,随着相关举措的出台和落地,将会对国际商务人员往来提出更清晰的标准和流程,比如,“‘7+3’是不是进一步缩短,甚至有一些快捷通道的方式”,这也会是在短期内效果突出的一项举措。

在引导投资方向,提升外商投资质量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明确要优化外商投资结构、支持外商投资创新发展、加快外商投资绿色低碳升级。

其中,对标“十四五”规划纲要要求,在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方面,重点鼓励外商投资高端装备、基础元器件、关键零部件等领域。在现代服务业方面,重点鼓励外商投资研发设计、现代物流等领域。在节能环保方面,重点鼓励外商投资新能源、绿色低碳关键技术创

新和示范应用等领域。

同时，引导外资积极参与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实施工业低碳行动和绿色制造工程，支持开发绿色技术、设计绿色产品、建设绿色工厂，打造绿色供应链，创建绿色设计示范企业。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平等参与绿色低碳领域相关标准制修订，科学确定国家重点产品能效能耗限额要求。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参与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做能效、水效等方面的“领跑者”。

“此次政策特别注重提升外资质量，呼应了二十大报告提到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也必然包含着我国利用外资在保证数量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提升质量。”王军说。

## 2 外资在华升级

王军认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相关部委还会就改革开放、建立统一大市场以及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出台更多具体的措施。随着一系列开放政策的推进和落地，中国对外开放和深化改革的决心会越来越明确，也会更好地打消外界的疑虑，为外资注入更强的信心和动力。

事实上，中国重点鼓励的方向，也正是外资瞄准的机遇和未来。他们看重中国的理由，也不再仅仅只是市场，还有成熟完善的产业链生态，以及可以向全球输出的创新力与中国方案。在中国深耕多年的外资，正在加速升级在华战略，以更加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姿态，融入中国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

10月18日，全球光学及光电技术领军者蔡司在苏州工业园区奠基启动“凤栖”工程建设，这是蔡司在国内首次购地自建项目，也被视为蔡司在中国本土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与扩展。蔡司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福斯特（Maximilian Foerst）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蔡司始终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并将继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资，进一步深化本土化创新战略。

布鲁纳告诉第一财经，贺利氏电子对于投资中国市场的信心和加码布局的计划没有改变。贺利氏电子在常熟的工厂从早期主要进口德国的原料到现在90%以上都在中国采购、中国生产和中国销售，本地化不断提升，随着设备和产线的不断升级，产品的附加值也显著增加。在高度本土化的同时，他们也把在中国研发出的技术和产品输出到海外的工厂乃至更大的市场。

布鲁纳21日对第一财经透露，除了现有的两家合资公司，贺利氏电子在中国正在积极选址，筹划成立第三家公司，专注于服务电动汽车产业。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2年1~8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927.4亿元人民币，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6.4%。其中，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同比增长了33.6%。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增合同外资1亿美元以上大项目185个，相当于平均每天有1.5个外资大项目落地。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近日在党的二十大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吸引外资克服多重困难，实现了稳中有增、稳中有提质的明显成效。总的看，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有信心，对中国市场长期看好。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告诉第一财经，今年以来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持续保持增长态势。这主要因为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在世界经济变局中还表现出相对的稳健性。此外，中国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是一致的，外商投资看中了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良好

态势和强大韧性，同时也看中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巨大的市场机遇。

作者：缪琦 祝嫣然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A01版

# 解码全球价值链 中国企业应该怎么做

十余年间，“价值链”以及更加学术化的“增加值贸易”概念，从国际贸易研究圈内的小众讨论，随时代涌动，突破了学术圈层，成为了几乎所有人都关心的话题。

不过，宏大叙事之中，价值链究竟从微观层面如何拆解？在传统贸易统计方式衡量价值链贸易关系有显著的“扭曲”之时，是否应当建立新的贸易统计体系？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邢予青在他的专著《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中用一句简单的话即可解释：“以布换葡萄酒这种古典贸易理论为基础的贸易统计体系，不适合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现代贸易。因为沿价值链制造的产品的总增加值，不能归于任何一个国家。相反，它分布在所有参与制造过程的国家之间。”

实际上，在众多国际机构推出各自的价值链贸易数据库之前，邢予青教授已经对全球价值链贸易进行了开创性研究。2009年，他购买了人生中第一部苹果手机 iPhone3G，也第一次看到了“由苹果公司在加利福尼亚设计，中国组装”（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这句话，在意识到 iPhone 是说明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和全球价值链关系的切合案例之后，彼时尚在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工作的邢予青同其助手一起以 iPhone3G 的拆解数据为基础，计算出了惊人的结果：中国仅为每部 iPhone3G 贡献了区区 6.5 美元的组装服务，大约占总制造成本的 3.6%。但是在出口时，该产品被认为为中国创造了 179 美元的高科技出口。

邢予青教授意识到，这意味着，传统贸易统计，夸大了中国对外出口的实际规模，同时也夸大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他认为，在全球价值链主导贸易的时代，应当使用出口增加值，而非出口总值来衡量中美双边贸易关系。

随后，出口增加值议题伴随国际主流媒体对邢予青教授的 iPhone 案例研究的广泛传播进入主流视野，并逐渐被国际机构采纳。2021年，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主导、策划，并与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内外组织机构共同撰写和出版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 2021：超越制造》出炉了，邢予青教授作为报告主编，在报告中对无工厂制造商（Factory less manufacturers）主导下的全球价值链，以及利用全球价值链向全球客户出口无形资产服务的新商业和国际贸易模式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

全球价值链在促进生产率增长和提高创新绩效方面的作用究竟如何？供应链转移究竟如何评判？邢予青在同第一财经记者的专访中逐一回答了上述内容。

## 1 中企沿产业链不断提升

第一财经：在谈到贸易结构优化时，目前多会强调一般贸易占比上升，这是为何？

邢子青：整体而言，中国的出口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出口，另一类为加工出口。在全球价值链主导国际贸易的时代，衡量出口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贡献时，我们必须分析出口产品和服务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因为只有这一部分才可以增加国民收入和创造国内就业。根据我的计算，加工出口在 2018 年的国内增加值比例不到 40%，而普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则是 76%，后者远远大于前者。由此看出，加工出口比例不断下降，普通出口比例不断上升，说明中国每出口 100 美元的产品，对国民收入和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大。

其次，加工出口占比逐年下降、普通出口逐年递增的现象，也说明国内企业的技术在不断进步，生产替代进口零部件的能力与日俱增。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国内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了沿产业链的不断提升。这一变化显示加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企业，没有被“低增加值陷阱”困住，而是不断朝高增加值的环节迈进。

但是，加工贸易对于目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需要创造大量就业的中国经济而言，依然重要。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加工贸易的规模时。例如，据我测算，中国对每一部组装的 iPhone X 的增加值的贡献是 104 美元，大约相当于 iPhone X 全部制造过程增加值的 25%，远远低于普通出口产品国内增加值 76% 的水平。但是，美国的苹果公司每年销售两亿多部 iPhone。作为苹果公司 iPhone 组装基地的中国，从 2 亿多部 iPhone 中，获得的收入就是 200 多亿美元，以及超过百万的就业岗位。这是不容小觑的规模贡献。因此，即使中国继续从事类似的组装装配任务，我认为也是一件促进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好事。

第一财经：中国企业目前在全球价值链上位置如何？如何面对目前价值链调整所带来的潜在挑战？

邢子青：从各个产业来说，我认为在白色家电领域，如空调、洗衣机、电冰箱和电视等，中国企业已经完全实现了技术独立并拥有国际知名品牌。在电脑领域，联想电脑的国际市场份额超过 20%。在智能手机领域，前五大国际知名品牌中，三大品牌都是中国的。可以说在这些领域，中国企业已经打造了自己作为主导企业的全球价值链，攀登到了这些产业价值链的顶端，并且获得了最多的增加值。

但在其他的许多产业，中国并没有全球价值链的主导企业。特别是服装、鞋靴和玩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尽管我们具有生产上的比较优势，但我们的企业仍处于获取增加值较低的位置。譬如，中国是世界上出口鞋最多的国家，但没有一个全球性的鞋履品牌；又如，中国是玩具出口最多的国家，也没有一个国际知名的玩具品牌。

尽管中国的一些企业已经成为了价值链上的主导企业，但大部分的企业依然属于价值链的从属企业。这也是许多外贸企业经常会担心订单减少的原因。这些外贸企业基本上只承接生产、制造和装配环节的任务。这样做的好处是它们无需在研发和营销上进行投入，避免了打造全球销售网络和国际知名品牌带来的高风险。但劣势是，它们的话语权极低。举例来说，沃尔玛在中国有大约 4.8 万个供应商，这些大多是中小规模的企业，它们生产的产品基本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果沃尔玛停止下订单，它们就会存在生存问题。

为了应对全球产业链调整所带来的挑战，中国企业应该考虑打造自己的品牌，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并且，中国企业应该尽可能在技术环节实现突破。比如在原材料或者零部件制造方面，如果能够开发出相对不可替代的技术，那么价值链的外国主导企业就不能轻而易举地把中国企业从价值链上甩出去。

## 2 “无工厂制造商模式”是聪明的资产

第一财经：中国的小米、OPPO 在印度的贸易模式，是否与苹果在中国的“无工厂制造商”模式相似？这种模式的好处在哪里，是否值得更多企业效仿？

邢予青：无工厂制造商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全球价值链实现的一种新模式。这种新模式的好处是轻资产（Asset light），或者叫聪明的资产（Asset smart）。

以苹果公司为例，乔布斯时代苹果仍有自己的工厂，但苹果现任首席执行官库克加入苹果公司后，苹果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去工厂化，把所有制造过程全部外包给其他公司，苹果只从事产品设计、软件开发和市场营销等环节。这样做的原因是，苹果公司不需要投资生产设备，不需要盖储存原材料和产品的仓库，现在这些任务都由富士康和苹果的其他供应商来做。

更重要的是，机械设备等实体资本是不断贬值的，而人力资本是不断增值的。例如，一个使用了十年的机器经过折旧后价值归零了；而一个从业十年的设计师或者软件工程师，他的价值是远远超过十年前刚入行之时的。另一方面，品牌等无形资产的规模效益也是巨大的，甚至是无限的。一台机器能生产的产品数量是固定的。但是一个 iOS 系统、一个品牌标识却可以被用在无限多的手机上。因此，无工厂这种新商业模式能够实现无形资产的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模式，是苹果公司市值超过 3 万亿美元的主要原因。

小米就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无工厂制造商，它侧重的是品牌打造、产品设计，以及线上零售端的控制。OPPO 也是侧重于设计和品牌打造，OPPO 手机的背后写的就是“OPPO 设计中国组装”（Designed by OPPO Assembled in China），但它并不完全是无工厂制造商，OPPO 有自己的组装厂。

不过，与苹果不同的是，小米和 OPPO 并没有自己开发的操作系统，只是做了一些边际性的创新。苹果不仅有品牌和独特的产品设计，还有独立的操作系统和芯片，实现了“软硬一体”化。我并不是在批评中国企业，作为后发企业，它们如果要在技术上取得突破，需要很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持续的巨额技术投资。所以，后发企业想快速进入一个新兴的技术产品市场时，采取沿价值链非线性进步的策略，是一种捷径。

从品牌打造上说，考虑到全球品牌知名度和市场份额，我认为小米、OPPO 和 vivo 都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在个人电脑领域的联想也是如此。品牌溢价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增值，也是一种革新，这都是中国企业利用全球价值链战略做得很成功的部分。但未来，这些成功的企业应该利用已经积累的资本，在核心技术上获得突破。

作者：冯迪凡 高雅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22 年 11 月 14 日第 A05 版

## 保障数据安全有序跨境流动

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提出的有关贸易发展的未来走向。在这些表述中，“创新”与“数字”是重要的关键词。而数字服务贸易，正是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对服务贸易的一种创新，值得关注。

数字服务贸易，一般指数字技术与服务贸易融合产生的新业态新模式。近年来，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有关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总值达3596.9亿美元，同比增长22.3%，占服务进出口比重达到43.2%。《“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也将数字贸易列入服务贸易发展规划，明确了未来一个时期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重点和路径。同时，随着数据要素驱动，数字服务贸易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拓展，发展质量与效益不断提升。

不过，要持续推进数字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一个前提，即其依赖的关键性要素“数据”必须是安全可靠的。因此，如何在发展数字服务贸易的过程中，合理科学地保障数据有序、安全、积极地实现跨境流动？对此，可从监管、技术创新、国际标准制定等多个角度入手。

其一，完善数据流动顶层设计，明确数据安全监管责任。对于跨境经营数字服务的企业，需出台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权利与责任，要依据不同类型数据的敏感程度与风险程度，明确数据跨境流动规则。还应通过不断完善数据安全评估流程与数字服务行业规范，提升国家对数据资源的监管水平。

其二，加快数字技术创新进程，提升数据风险应对能力。技术是数字服务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尤其用于数据开源、分析与流通的新兴技术，在优化服务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此，要谨慎应对技术带来的数据安全风险，比如，在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中，警惕公钥与私钥信息的传播与使用，明确数据管理权限，避免数据泄露。为了确保数据资源在数字服务贸易过程中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尚需学界与业界的共同努力。

其三，提升国际竞争力，参与相关标准制定。数字服务贸易与数字技术成熟发展、经济全球化场景息息相关，我国应当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制定，在倡导合作共识的基础上争取主动权。

**作者：**胡宏超

**来源：**《经济日报》2022年11月17日第005版